

《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2010）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1 (2010), 142-162*

## 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 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

王兆鹏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 摘 要

20世纪百年间究竟产生了多少项词学研究成果？在不同年代成果量有何变化？这些变化有何规律？是何原因？这些问题，迄今没有大答案，经全面盘点，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总量高达22909项，与其他科学文献一样，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它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起步初始阶段（1901-1932），成果总量为476项，年均14.9项；迈步发展阶段（1933-1955），总量有1496项，年均65项；踏步缓行阶段（1956-1978），总量是3322项，年均144.4项；跨步腾飞阶段（1979-2000），成果总量达到17615项，年均800.7项。1933-193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第一次快速增长，得益于词坛领袖龙榆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文革”十年词学研究成果量仍然能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则是由于“海外军团”的崛起。1979年以后词学研究飞速发展，与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而与教育制度的变化和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二十世纪词学 成果量 计量分析 词学史

\* 本文为王兆鹏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的定量分析》（项目编号：03JB750.11-44013）成果之一。

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近年已有不少的论著予以回顾和总结，但都是定性的分析和模糊的把握。如果我们要问：20世纪百年间究竟产生了多少项词学研究成果？在不同的年代成果量有何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何规律？是何原因？这些问题，迄今没有答案，似乎也无人关注。因为学术史的研究，多年来人们只习惯于定性的考察、感性的分析，而不注意用统计的方法去定量分析学术史的进程及其变化。计量学术史，还没有引起注意，本文算是计量学术史的首次尝试。

我们历时十年，全面盘点了20世纪词学研究的家底，搜罗了1901-2000年海内外词学研究论著的所有目录。在时贤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数十次的增订补充，我们最终搜集到了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目录22909项（一本著作、一篇论文、一部词选等均作1项统计），并研制成《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总目检索系统》。有了这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用准确具体的统计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并可以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别样风景。

### 一、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规律

在计量文献学和计量信息学领域，衡量科学文献的增长，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每年新出版文献的数量为依据，一种是以每年出版文献的累积总量为依据。在研究文献增长的规律时，一般采取后者，因为“各年出版的文献逐年相加而得到的文献累积数量总是增加的，就有可能趋于某种固定的规律，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较为规则的曲线，都能用一个较为准确的函数来描述”，而前者，即每一年所出版的文献数量，“容易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总是波动的，结果往往是一些非规则的曲线，难以用某种函数来描述”，不利于规律的研究。但

是，前者“能直观形象地反映出每年新文献的变化趋势”，<sup>1</sup> 所以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

为了从不同的角度统计考察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变化，我们将20世纪词学研究每年的成果量和累积成果量制成一份总表，见表1。

表1：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与累积量总表

年份	当年成果量	累积成果量	年份	当年成果量	累积成果量	年份	当年成果量	累积成果量
1901	2	2	1935	157	940	1969	100	3797
1902	2	4	1936	131	1071	1970	147	3944
1903	0	4	1937	56	1127	1971	136	4080
1904	0	4	1938	13	1140	1972	112	4192
1905	3	7	1939	26	1166	1973	140	4332
1906	6	13	1940	61	1227	1974	150	4482
1907	4	17	1941	107	1334	1975	208	4690
1908	11	28	1942	76	1410	1976	163	4853
1909	7	35	1943	62	1472	1977	203	5056
1910	13	48	1944	38	1510	1978	238	5294
1911	6	54	1945	19	1529	1979	411	5705
1912	1	55	1946	54	1583	1980	583	6288
1913	8	63	1947	73	1656	1981	713	7001
1914	3	66	1948	87	1743	1982	820	7821
1915	11	77	1949	18	1761	1983	904	8725
1916	3	80	1950	14	1775	1984	879	9604

1 参邱均平《信息计量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45。

1917	2	82	1951	22	1797	1985	909	10513
1918	8	90	1952	17	1814	1986	964	11477
1919	4	94	1953	38	1852	1987	903	12380
1920	6	100	1954	44	1896	1988	820	13200
1921	4	104	1955	76	1972	1989	686	13886
1922	6	110	1956	100	2072	1990	711	14597
1923	20	130	1957	209	2281	1991	844	15441
1924	16	146	1958	135	2416	1992	811	16252
1925	19	165	1959	142	2558	1993	770	17022
1926	34	199	1960	89	2647	1994	735	17757
1927	50	249	1961	193	2840	1995	823	18580
1928	32	281	1962	271	3111	1996	758	19338
1929	67	348	1963	116	3227	1997	926	20264
1930	43	391	1964	98	3325	1998	840	21104
1931	49	440	1965	77	3402	1999	865	21969
1932	36	476	1966	102	3504	2000	940	22909
1933	155	631	1967	97	3601			
1934	152	783	1968	96	3697			

我们先看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总量所反映出的增长规律。科学文献增长的重要规律之一，是美国著名的文献计量学家普赖斯提出的“指数增长规律”，<sup>2</sup>即“任何正常的日益增长的科学领域内的文献是按指数增加的”。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累积量，也基本上按指数规律增长的。将表1的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输入计算机后，Excel电子表格可以自动计算出其增长指数，并描

2 参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93。



述出指数增长的曲线，见图1。

图1：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的指数增长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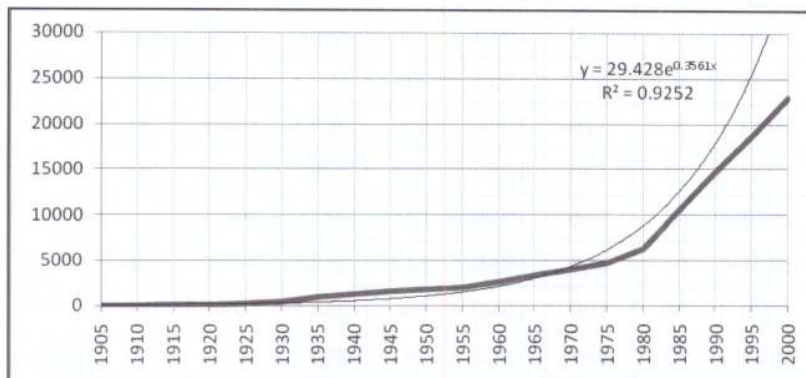


图1是以5年为一个时段来统计，纵坐标为累积成果量，横坐标为年份。表中的粗线，是计算机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实际增长的指数而自动生成的曲线，即实际增长曲线。表中的细线，则是计算机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反映的指数增长关系模拟出来的趋势曲线，即预期增长曲线；两条曲线的吻合（重合）度愈高，表明实际增长的指数关系与预期增长的指数关系愈加一致。图中的数值R2，就是表示两条曲线的相关性、吻合度的，其范围是0-1，数值越接近1，表明相关性、吻合度越高。而图1中R2=0.9252，这个数值表明，实际增长的指数曲线与预期增长的指数曲线之间的吻合度、相关度非常高，换言之，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增长量非常符合指数增长曲线。这也表明：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与其他科学文献的增长趋势相符，符合科学文献增长的一般规律。

从图1可以看出，1930年代以后生成的粗线在模拟细线之上，说明1930年代的成果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超过了常规增长态势。而1980年代，增长速度迅猛，1990年代中后期增长速度放

慢。且看下面这组数据：

第一个5000项，用了77年的时间：1901-1977；

第二个5000项，用了8年的时间：1978-1985；

第三个5000项，用了6年的时间：1986-1991；

第四个5000项，用了6年的时间：1992-1997。

1978-1985年8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相当于此前77年成果量的总和，可见其增长速度之快。而第三个5000项与第四个5000项所用时间相同，表明1986年以后词学研究成果的增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之后，年度增幅放慢，每年的年产量是平稳中有升有降。

再从单年的产量来看。表1显示，一百年间，词学研究成果的年产量极不平衡。1903-1904年的成果量为0，除去这2年，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最低的是1912年，全年仅有1项；最高的是1986年，达到964项，这一年的成果量，比1901-1935年35年间的成果总量还多。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百年间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的涨落变化，我们制作了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的柱形图（见图2），图中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每年对应的成果量。

图2：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变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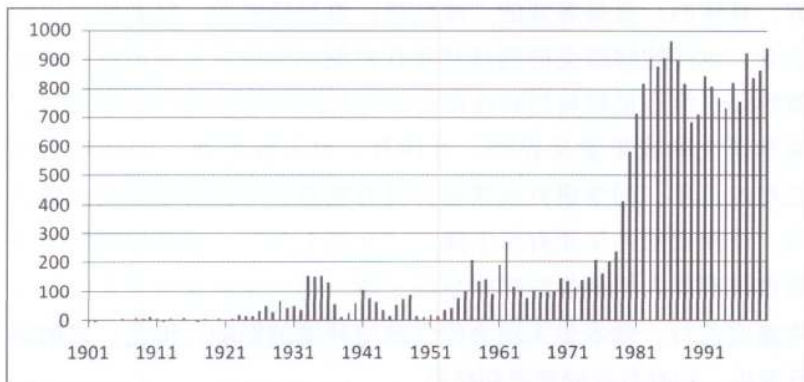


图2显示，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不是直线型的上升，而是在总体上升过程中波动变化，时涨时落。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时段，前80年，是低速前行，小幅走高；后20年，是高速发展，小幅震荡。1976年以前，除1957、1962、1975年这3年之外，其他年份的年产量都是在200项以下徘徊；1979-1980年，为转型过渡期，年产量达到500项左右。1981年以后，进入高速发展期，此后20年的年产量，一直是在700项以上高位运行（只有1989年略低于此数）。

从发展进程来看，1932年以前，词学研究的年产量相当低下，年均不足15项。1933-1936年第一次出现快速增长之势，每年成果量平均达到近150项。之后，又急剧跌落，以至于1938年只有13项成果。1941年前后，一度小幅走高，1945年以后又转入低谷。1945-1955年，成果总量只有462项，年均42项。直到1956年，才有所回升，此后即平缓发展。1956-1976年的成果量基本都保持在100项以上，年均成果量有137项。到1979年，开始提速，增幅扩大。1981年后，就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20年的成果总量达到16621项，是前80年成果总量（6288项）的2.64倍，年均成果量高达831项。

统计数据提供的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变化的结果，是直观的、具体的，更是客观的、准确的，也是新鲜的。熟悉词学史的学者，也许能够感受得到1930年代初期词学研究曾经出现过的短暂辉煌，但是很难料想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的1941年前后，词学研究的成果量又曾经一度回升；也不曾想到，1949年建国之初的几年，词学研究成果量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大幅走高，反而比前几年还有所下降。“文革十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也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急剧下滑，仍然基本保持着此前的平均速度前行。学术史无疑会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它的运行发展，却有自身的规律和路径。

## 二、20世纪成果量变化的四个阶段

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实际变化，我们将百年间的词学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起步初始阶段（1901-1932）：成果总量为476项，年均14.9项；

迈步发展阶段（1933-1955）：成果总量为1496项，年均65项；

踏步缓行阶段（1956-1978）：成果总量为3322项，年均144.4项；

跨步腾飞阶段（1979-2000）：成果总量为17615项，年均800.7项。

第一个阶段（1901-1932），为起步初始阶段，历时32年。成果年产量和总量都比较低。作为现代学术形态的词学研究，当时是刚刚起步，“词学”（词的学理研究）与“学词”（词体的学习创作）混沌不分，<sup>3</sup>“词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当时的学者，只是凭个人兴趣，偶尔涉及而已。

从作者队伍来看，当时专力从事词学研究的学者不多。世纪之初的32年，发表了3项以上词学研究论著的作者共27人，其中位居前十名的活跃作者（详表2），除了赵万里致力于词作辑佚和词集版本研究、况周颐专心于词话的写作、胡云翼专注词史的研究之外，其他学者的主要学术重心、学术兴趣都不在词学研究领域，诸如词学研究成果量较多的胡适、郑振铎、冯沅君、梁启超和王国维等，都不是专门研究词学的学者，虽然王国维和胡适对后来的词学研究影响甚巨，但词学研究在其整个学术视野中占的比重不大。

3 参王兆鹏《20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页106-113。



表2: 1901-1932年词学研究的十大活跃作者及其成果量

作者	赵万里	况周颐	胡适	郑振铎	胡云翼	冯沅君	梁启超	任二北	王国维	铃木虎雄
成果量	27	13	12	12	9	8	8	8	7	6

从论文发表的刊物阵地来看,当时学术刊物的数量原本不多,更没有专业的词学杂志。32年间,发表词学论文比较多的只有《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20篇)、《小说月报》(12篇)、《国粹学报》(7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6篇)等四个刊物。

可以说,词学研究的专家少、专刊少,是20世纪头32年词学成果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与专业刊物的传播密切相关。有发表阵地、有便捷的发表渠道,往往能够激发学者的研究热情,提高学术成果的产量。这期间,赵万里在“自家”刊物《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上发表词学论文20篇,郑振铎在自己主编的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词学论文12篇,便是明显的例证。<sup>4</sup>

第二个阶段(1933-1955),历时23年,词学研究开始迈步向前发展,年均成果产出量比上一阶段提高了3.39倍。从1933年起,至1936年,连续4年词学研究成果量快速增长。由此前的年均成果量不足15篇快速提高到年均成果量150篇,年均成果量提高了9倍。4年成果量分别为155、152、157、131项,共计595项,比1901-1932年的成果总量476项还多119项。

4 赵万里1927-1929年在北海图书馆工作,《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是其馆刊,属于“本单位”的刊物,赵万里为该刊编纂委员,在该刊发表文章很便利。郑振铎是《小说月报》的主编,在此刊载文章,更是近水楼台。

1933-1936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为什么突然大幅度上升？这固然与词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词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有关，更与一位词坛领袖、一个词学专刊有关，亦即得益于龙榆生先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和吸引。<sup>5</sup> 这只要看看当时成果量的刊物分布（见表3），就可以看出《词学季刊》举足轻重的地位。

表3：1933-1936年发表词学论文最多的十大刊物

期刊	词学季刊	青鹤	青年界	新时代月刊	学风	人间世	中央日报	天津益世报	北平晨报	大公报
篇数	183	27	26	15	11	10	9	8	8	8

1933-1936年的成果总量为595项，其中《词学季刊》发表成果就有183项，占同期成果总量的30.8%。《词学季刊》一个刊物发表的词学论文量，既比1901-1932年发表词学论文最多的四个刊物所发词学论文总量（45篇）多出3倍，也比同期发表词学论文最多的其他9个刊物的词学论文总量（122篇）多61篇。可见，无论是跟1930年代以前的刊物相比，还是跟1933-1936年同期的其他刊物比较，《词学季刊》都是发表词学论文最多的刊物。

再从作者队伍的角度来看。1933-1936年间，发表了3项以上论著的活跃作者共有36人，其中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张尔田、赵尊岳、吴梅等十大活跃作者的词学论文大多数是发表在《词学季刊》上（见表4），而张尔田、叶恭绰的词学论文，更全部是

5 《词学季刊》，1933年由龙榆生在上海创办，历时4年，1937年因抗战而被迫停刊，前后共出11期。1985年，上海书店将各期汇成《词学季刊》上下二册予以影印出版。

发表在《词学季刊》上。

表4：1933-1936年词学研究的十大活跃作者及其成果量的刊物分布

作者	龙榆生	夏承焘	唐圭璋	张尔田	邹啸	赵尊岳	吴梅	卢冀野	叶恭绰	夏敬观
成果总量	36	25	23	19	14	9	8	7	7	6
词学季刊发文章量	29	17	13	19	0	6	6	3	7	1

当时词学研究的十大活跃作者，除了邹啸和夏敬观之外，都跟《词学季刊》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正是《词学季刊》，造就了这些词学研究的活跃作者，培养出了一批后来成为词学研究宗师级的词学专家。

作为20世纪第一份专业的词学杂志，《词学季刊》原本没有任何稳定的作者队伍，作者队伍都是由主编龙榆生先生组织和联络的。正是由于龙先生持之以恒的约稿，才促使这些作者不断提供最新的词学研究成果，使这些在上一个时期并不算活跃的作者成了词学研究的活跃作者。这只要考察一下这时期的三位活跃作者、后来成为一代词学宗师的唐圭璋、夏承焘和龙榆生先生1933年前后词学成果量的变化，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唐圭璋先生，1926年在《东南论衡》上发表第一篇词学论文《温韦词之比较》，过了5年，到1930年1月才在《中央日报》发表第二篇《女性词人秦少游》，也就是说，从1926-1932年的7年，唐先生只发表了2篇论文。而1933年1年，他在《词学季刊》上就发表词学论文8篇，次年又接着在该刊上发表论文4篇。2年内唐先生词学成果量的剧增，无疑与龙榆生先生的定期约稿有关。

夏承焘先生，则是1931年开始在《暨南大学文学院集刊》上



发表处女作，次年在《之江学报》和《燕京学报》发表论文4篇。1933年，他在《词学季刊》上发表论文5篇，接下来3年连续在该刊上发表论文12篇。如果没有龙榆生及其主编的《词学季刊》，这几年夏先生恐怕也不会如此高产。

龙榆生先生本人，自1929年开始与辛梅臣合作发表第一篇词学论文《辛稼轩年谱》，到1932年总共发表词学论文5篇。而1933年他创刊《词学季刊》后，身体力行，既任主编，又任“主笔”，一年之内就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词学论文17篇，四年共发表文章36篇。他主编《词学季刊》的四年，是他学术生涯中创造力最旺盛、学术成果最丰厚的一个时期。他毕生的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106项，而四年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就占了其成果总量的1/3。由此不难看出主编《词学季刊》，在龙先生词学生涯中的重要性。此其一。

其二，这期间的活跃作者，特别是龙、夏、唐三先生，在词学史上有影响的代表性论文，基本上都是发表在《词学季刊》上。《词学季刊》每期的开篇压卷之作，都是龙榆生本人亲自撰写的大块理论阐释性文章，诸如《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研究词学之商榷》、《选词标准论》、《词律质疑》、《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南唐二主词叙论》、《论平仄四声》等。这些论文，大多是词学研究领域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力作，影响深远。如果说龙先生是以理论阐释性见长，那么夏先生则是以词人年谱之作为人称道，唐先生以词作辑佚和词人词作版本考订而享誉学界。而夏先生和唐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发表在《词学季刊》上。夏先生的《南唐二主年谱》、《冯正中年谱》、《张子野年谱》、《晏同叔年谱》、《贺方回年谱》等，都是首先刊载在《词学季刊》上，后来结集为《唐宋词人年谱》。唐先生的宋词辑佚和考订的名作，如《从永乐大典内辑出直斋书录解题所载之词》、《石刻



宋词》、《四库全书宋人集部补词》、《汲古阁所刻词补遗》和《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互见考》等，也都是最先揭载于《词学季刊》。正是这些论文，奠定了龙、夏、唐三先生在20世纪词学史上的大师级地位。而这些论文，又是应《词学季刊》的需求而创作的。所以，说《词学季刊》造就了这时期的活跃作者，有力推进了这时期词学研究的进展，并不算过份。

1936年，《词学季刊》停刊后，词学研究成果量便立即下滑。这又从反面证明了《词学季刊》在当时词学研究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1939年的成果总量只有95项，年均31.7项。而1940-1944年的成果量又有回升，5年共有344项，年均68.8项。1937-1944年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同在战时，何以前3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很低，而后5年的成果量又走高了呢？这又与龙榆生先生的努力和他主编的《同声月刊》有关。

《同声月刊》1940年12月创刊于南京，1945年停刊，历时5年，编辑体例与《词学季刊》相类，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与战前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以前。但在龙先生的苦心经营之下，仍有名家如冒广生、俞陛云、夏敬观等坚持为之撰稿，不仅如此，《同声月刊》还注意联络同仁，开展学术讨论，如组织吴庠、张尔田、施则敬、陈能群等讨论四声问题，相关论文，至今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词学文献。

《同声月刊》虽然内容不限于词学，但主要是发表词学研究论文，共计发表词学研究论文182篇，占同期（1940-1944）整个词学研究成果总量283项的64.3%。一个刊物，占了同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的一半多，我们不能不再次感佩龙先生的努力和贡献！

龙先生本人跟办《词学季刊》一样，也是一身兼任《同声月刊》的主编与“主笔”，他在《同声月刊》上发表的论文累计42篇，是该刊八大活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多的“首席”作者，也是

他学术生涯中第二个多产的高峰期。1933-1944年，龙榆生先后在自己主编的《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里，共发表论文78篇，占其毕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106项的73.6%。可见，《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不仅对20世纪词学研究贡献巨大，对龙先生本人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关系重大。

表5：1940-1944年《同声月刊》活跃作者的发文量

作者	龙榆生	俞陛云	冒广生	赵尊岳	陈能群	夏敬观	吴庠	张尔田
篇数	42	23	22	11	10	10	8	4

如果说《词学季刊》培养了唐圭璋、夏承焘等词学研究的活跃作者，那么《同声月刊》则造就了冒广生、俞陛云等活跃作者（见表5）。冒广生的词籍校勘记、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都是连载于《同声月刊》。冒氏平生的词学研究成果为28项，俞氏毕生的词学研究成果为25项，而两人分别在《同声月刊》就发表了22和23项。如果没有《同声月刊》，很难想像冒氏、俞氏这些词学研究能否及时问世和传世。

在现代学术进程中，学术领袖和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的引导推动作用，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

第二阶段为什么延续到1955年，而不按通常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的分期以1949年为界？这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从旧中国过来的学者处在一个调整适应时期，新时代培养的学者尚未崭露头角，因而成果量不仅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提升，反而有所下降。1950-1955年的成果总量为211项，年均35.2项；而1945-1949年的成果总量却有251项，年均50.2项。解放后6年的年均产量较此前几年的年产量降低了4成。如果将1950-1955年

的成果量再按地域来分，<sup>6</sup>那么，更显此时中国大陆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大幅下滑。建国初的六年，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211项，其中大陆产出的研究成果只有82项，年均13.6项，降到了30年代以前的水平。此时词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也没有明显的进步。所以，根据成果量的实际变化情况，将第二个阶段的下限延至1955年。

第三个阶段（1956-1978），为踏步缓行阶段，历时也是23年。这时的成果总量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年均产量也有较大的提升，但就整个词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这期间的发展速度却还是比较缓慢的，年均产量固然达到了144.4项，但较之前一阶段，年均产量只提高了1.2倍，环比增速下滑了2倍多。

195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开始出现上升之势，年产量达到100项，此后的年均成果量在100项以上。为什么1956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开始上升？因为这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激发了中国大陆学术研究者的热情。此后几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明显提高，1956-1965年词学研究成果的总量为1430项，其中中国大陆产出的成果为950项，年均达到95项，这比1950-1955年中国大陆词学研究的年均成果量（13.6项）提高了近6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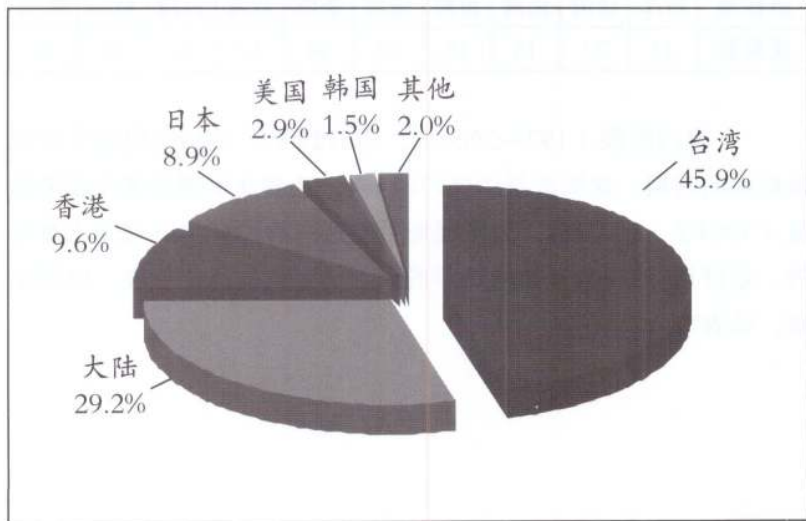
在这个阶段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文革”十年（1966-1976），其时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仍然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总量为1451项。其中1966-1969年共395项，年均成果量都在100项左右；而1970-1976年共1056项，年均151项。这表明文革十年的词学研究是在逐步增长。若跟文革前10年（1956-1965）词学

6 1949年以前，海外词学研究成果不多，所占比重不大，故不作区域比较。具体而言，1901-1949年的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1761项，中国（含港台）产出的成果为1679项，海外的成果量为82项，仅占总量的4.6%。1950年以后，海外研究成果才日益增多，在整个词学研究成果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

研究的成果总量1430项比较，文革十年的词学研究成果总量并没有下滑而略有增长。在那个“大革文化命”、正常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滞的年代，词学研究居然还有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惊诧！

仔细检阅文革期间的词学研究成果，原来这个时期词学研究的主力军已由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军团”所代替。此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1451项，中国大陆发表、出版的论著仅有424项，占同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的29.2%，海外研究成果量为1027项，占同期成果总量的70.8%。文革期间，当中国大陆正常的词学研究被压制、排斥的时候，海外的词学研究队伍异军突起，从而使文革十年整个的词学研究成果量保持着一种稳步发展的态势。

按地域来分，此期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是：台湾 667项、大陆424项、香港 139项、日本 130项、美国 42项、韩国 22项、其他国家和地区29项。图示如下：





在“海外军团”中，以台湾地区的词学研究最为活跃，其成果量占了同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的45.9%，差不多占了当时整个词学研究的半壁江山。而此期大陆的成果量，只有台湾的6成，不足同期成果总量的1/3。

文革期间，词学研究队伍中，成果量位居前10名的活跃作者，也全部是“海外军团”（见表6）。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期成果量最多的，是日本著名的词学专家村上哲见先生，他以31项的成果量位居此期十大活跃作者的榜首；名列第十的是韩国的车柱环先生。有两位外国学者晋升十大活跃作者之列，也算是文革十年全球词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十大活跃作者中的其他几位，除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外，都是台湾的学者。

表6：1966-1976年间十大活跃作者及其成果量

作者	村上哲见	周宗盛	张梦机	韦金满	郑騫	饶宗颐	陈宗敏	张惠康	李安	车柱环
所在地	日本	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	香港	台湾	台湾	台湾	韩国
成果量	31	27	18	15	15	14	12	12	11	10

第四阶段（1979-2000），历时22年，是20世纪词学研究最辉煌的时期，成果总量达到17615项，是前78年词学研究成果总量（5294项）的3.3倍。为直观地了解这一阶段词学研究的飞速发展，兹将1979-2000年与前78年的词学研究状况列作一表，以便比较，见表7。

表7：1979-2000年与前78年词学研究情况对照表

年代	论著总量	年均成果量	作者总人数	10项以上成果的作者	报刊和出版社	载有10篇以上词学论文的报刊
1901-1978	5294项	67.8项	2967人	71人	1848家	80种
1979-2000	17615项	800.7项	8563人	252人	3608家	354种

从表7可见，后22年的年均成果量比前78年提高了近11.8倍，作者队伍也扩大了2倍。发表或出版过词学论著的人数，后22年有8563人，前78年有2967人。假设前78年的所有作者在后22年仍有成果问世，或者假设后22年作者队伍中包含前80年的所有作者，后22年也净增作者5596人。从个体产出量来看，发表过10项以上成果的活跃作者，前78年只有71人，后22年多达252人，后者是前者的3倍。个体成果量的增加，与发表阵地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表、出版过词学研究论著的报刊和出版社，前78年有1848家，后22年多达3608家，净增1760家。其中刊载过10篇以上词学研究论文的报刊（含相关论文集），前78年为80种，后22年为354种，后者是前者的4倍多。

后22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海外的词学研究成果量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平衡发展的态势。由于1993年以后海外的词学研究成果收录不全，不便与收录全面的中国大陆的同期成果量作比较，故以中国大陆词学研究进入常态之后的1981-1991年跟文革期间的10年（1966-1976）作比较，以便观察了解海外词学研究发展的趋势，见表8。

表8: 1966-1976年与1981-1991年各地词学研究成果量增幅比较表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日本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其他
1966-76	424	667	139	130	22	42	7	22
1981-91	7495	792	259	204	172	111	55	65
增长倍数	16.6	0.18	0.86	0.57	6.8	1.6	7.86	1.8

从表8可见, 1981-1991年间, 词学研究成果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大陆, 这十年的成果量较文革十年间增长了16.6倍。而台湾增长不足2成, 香港增加不足1倍, 日本增加不足6成, 美国的增幅稍大, 增加了1.6倍。韩国和加拿大虽然增速较快, 但因基数太小, 在成果总量中占的份额有限, 对整个格局的变化影响不大。

表9: 1979-2000年成果量地域分布表

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	日本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其他
14653	1542	315	134	359	299	153	114	46

我们可以说, 20世纪最后的22年, 词学研究的辉煌, 主要体现在中国大陆。表9显示, 世纪末期的22年, 海外研究成果量(计2962项)仅占同期研究成果总量17615项的16.8%,<sup>7</sup> 中国大陆的成果量占同期成果总量的83.2%。

世纪末的20年, 中国大陆的词学研究, 之所以能走上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与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而与教育制度的变化和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

7 1993年以后海外研究成果统计资料不全面, 但这并不影响本节的基本结论。因为, 海外研究成果的增加, 必然会导致同期成果总量的增加。海内外成果总量的分布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关系。

中国大陆在1978年以来，高等学校大量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大批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人才。日益壮大的词学研究队伍，其成员绝大部分来源于高等学校毕业的和在读的研究生(此点将另文专论)。

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则催生了大量的专业期刊。1979年以后的22年间，累计发表100篇以上词学研究论文的专业刊物有10种(见表10)。

表10：1979-2000年累计发表100篇以上词学论文的十大报刊

来源	文史知识	文学遗产	古典文学知识	词学	大公报	名作欣赏	中国韵文学刊	国文天地	光明日报	抚州师专学报
篇数	393	321	292	250	220	174	144	116	115	107

这十大期刊中，除了《大公报》、《光明日报》和《文学遗产》是老牌刊物之外，《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词学》、《名作欣赏》、《中国韵文学刊》、《国文天地》(1985年创刊的台湾期刊)和《抚州师专学报》等7种都是1980年以后创刊的新的专业刊物。《文学遗产》虽然是创刊于1953年，但到1963年即停刊，期间只发表了9篇词学研究论文；1980年复刊，可谓是老树新花。

大量的词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创造了20世纪最后20年词学研究的辉煌；而大量的专业期刊，则为这一辉煌景观的呈现提供了适时的平台。



# **Research on lyric studies in 20th century: Stages of change and its factors**

**Wang Zhaopeng**, Wuhan University,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22909 results of research conducted on lyric studie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poetic ci genre) in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growing at a rate similar to studies in other sciences. It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change: 476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beginning stage (1901-1932) with a yearly average of 14.9 research results; 1496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primary stage (1933-1955) with a yearly average of 65 research results; 3322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growth stage with a yearly average of 144.4 research results (1956-1978); 17615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steady stage (1979-2000) with a yearly average of 800.7 research results. From 1933-1936, research on lyric studies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growth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famous scholar, Long Yusheng and the “Journal of Lyric Studies” edited by him. Lyric studies research could maintain a steady development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Foreign Legion” in 1966-1976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fter 1979, research on lyric studi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due to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is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Keywords:** 20th century lyric studies total of research quantitative analysis history of lyric studies